



敌后中共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 配备、选拔与规训^{*}

——以抗战胜利前后中共山西太南农村基层干部为例

杨奎松

内容提要 美国作家韩丁在《翻身》一书里描述了他亲历过的山西潞城县张庄战后土改的情况。他清楚地注意到：“地主阶级的独裁统治，被一批过去无地或者少地的年轻农民暂时取代了。”这些从旧社会污泥中爬过来，带有农民自私印记，见识和能力都较低的干部，往往很容易走上追求享受和滥权的歧途。韩丁因此发问道：他们能不能摒弃凭着领导地位而取得的特权，领导所有穷人站起来，使张庄摆脱过去那种绝境呢？“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见识和能力，那么谁有呢？”很显然，这对于必须依靠农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无疑是一个需要长期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 中共 农民 基层干部 太南 敌后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业人口长期占总人口 90% 左右。自 1927 年至 1945 年，中共十几年扎根农村，并且以贫苦农民为依靠对象，因此，不仅党员干部百分之八九十是农民出身，而且其中相当多数文化程度很低。即使在非敌后的陕甘宁边区，在实行国共合作政策并力行“三三制”的情况下，1940 年甘肃环县 37 位乡长，仍有 21 位完全不识字，14 人仅粗通文字，只有两个人受过些教育。边区政府和中共中央所在的延安，甚至还不如环县。1941 年延安县委就有报告说明，县里所有乡长都不识字。这种情况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共党的政策指示及其各级党政部门工作安排的贯彻落实。该报告指出：由于他们“一般缺乏文化知识，缺乏独立工作能力，同时相当浓厚的乡土观念、家庭观念，也成了他们进步和发展的重大限制”，因此，他们不仅难以在政治和政策层面上与上级领导机关保持良好沟通与互动，就是他们理应熟悉的土地问题，多半也很难处理好。因为执行上级下达的那些涉及阶级划分、土地评估标准之类的复杂的土地政策，对他们是太过困难的事情，因而他们往往会采取简单粗糙的做法。^①

* 本文是 2019 年 10 月 13 日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召开的“东亚战时动员的相位——冲击与遗产”中日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参会论文。

① 参见《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1943 年 2 月 24 日公布），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 7 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99 页；马克·塞尔登著，魏晓明、冯崇义译：《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45、156—157 页；周锡瑞：《从农村调查看陕北早期革命》，南开大学历史系等编：《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档案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545 页。

抗战期间中共敌后根据地干部的情况,也大略如此。相比较而言,另一种“敌后”,即仍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共游击区(也即“沦陷区”)的基层干部,由于文化程度低所带来的问题就表现得更加明显。强调敌后根据地和日本占领下的中共游击区的不同,旨在说明这种不同也必定会在农村基层干部党员的产生、表现上有所反映,上级部门对县以下基层干部的选拔、配备和要求,也必定会有不同。这种复杂状况,特别是基层干部党员观念、品行和能力参差不齐的情况,自然也会延续到战后。如何使农村基层干部,尤其是缺少长期系统教育训练的干部,在文化水平和政治能力上得到提升,懂政策、有理想、遵纪守法,对战后中共干部政策其实是一件相当困难又不能不解决的问题。

涉及上述问题的研究成果目前还很少见到^①,本文这里考察抗战胜利前后太南部分地区中共农村基层干部的情况,也只是试图强调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解决的困难性而已。

从韩丁笔下几个农村抗日青年谈起

读过美国作家韩丁(William Hinton)《翻身》一书的读者,相信都记得他笔下张庄几个青年在日本占领期间,冒生命危险,协助中共做地下工作的情况。他们不仅组织了“地下政府”,帮助八路军收集情报、征集粮食和被服,参与除奸和打击“顽军”(国民党在敌后的武装),而且还“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政治”,“尽最大力量攻读”毛泽东的著作,“开始懂得像阶级、劳动创造世界、社会发展史以及决定中国前途的土地改革的必要性等基本观点”。^②

根据韩丁了解到的情况,这个秘密组织的主要成员,一半都没有能够活到战后。是什么使这几个农村青年会跟着共产党而将个人生死置之脑后呢?他的解释是:自然村小沟村村长张天明和雇农申锁子,是因为接触到了中共潞城五区区长,有了抗日的要求;申的好友弓来宝是因为日子过得太苦,“为了求解放”;村中少有的富户子弟师福元是因为自己的家庭动辄受到兵匪抢劫和贪官压榨,“因此对旧的统治当局充满了仇恨”。他不经意地也提到了另一层原因,就是山西潞城张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张庄背后就是大山,往山里跑就能进到中共太行根据地去。故“风声紧急时,只要能避开,他们总可以上山去。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只要来得及,总可以请到八路军”。^③

韩丁能够了解到这些情况,是因为他在1948年春夏曾作为土改工作队观察员一度到过张庄,不仅亲历了张庄土改后期纠偏的经过,并且采访过当年参与过抗日秘密工作的几位年轻人。但比较他亲历的张庄土改纠偏,和村里许多人对1946—1947年土改情况及问题的描述,他对抗战期间张庄中共基层组织和干部党员情况的了解,应该并不深入,也不很准确。

比如,当韩丁提出:“为什么他们在随时都可能被逮捕和被杀害的情况下还留在村子里,而不到山里去参加正规军,拿起枪杆子进行战斗呢?”按他的说法,被询问的几位年轻干部完全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他们仿佛觉得那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沦陷村的工作需要人嘛”。但这种回答是否合乎实际呢?韩丁对此没有提出任何疑问。又比如,几位年轻干部回忆说,张天明等当年曾带领他们“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政治”和攻读毛主席著作,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韩丁照录了他们的说法,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当年像张庄这样的偏僻农村里,贫苦农民基本不识字的情况。张天明、师福元、申锁子、弓来保等,除师福元家庭条件较好外,穷木匠出身的张天明和身为雇农的申锁子、弓

^① 如周锡瑞《从农村调查看陕北早期革命》,《中外学者论抗日根据地》,第545页;李鹤:《抗战时期中共农村基层组织与党员发展之考察——以山西省长治县为例(1937—1945)》,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2011年;等。

^② 韩丁著,韩倞等译:《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103页。

^③ 韩丁:《翻身》,第98—101页。

来保等,怕是连学也没上过,能认多少字都是问题。

另外,韩丁对张庄沦陷期间形势变化背景的描述也不尽准确。按照他的描述,1943年之前在张庄为八路军收集粮食、被服,包括开展政治学习,都还相当便利,1943年以后“就被战争打断了”。不仅不能往太行根据地跑,也指望不上八路军了,就连中共地下的区县政府人员也联系不上了,敌伪的强化治安导致区村干部接连被杀,申锁子和弓来保穷困到没有吃的东西,为了熬过冬天,他们还不得不脱离秘密工作,跑到太原去打了几个月零工,直到春天才回来。

实际上,在张庄能够半公开地为八路军收集粮食、被服的时间,主要是1938—1939年。1940年3月15日八路军北撤^①后,太南各县就成了国民党中央军的控制区,中共各县区的党政组织也一并退出了该地区,农村中的政权和党组织均告瓦解。1942年春夏,日军对太北及晋东南国共各根据地展开大扫荡后,国民党军损失惨重,共产党八路军又开始以武装工作队的形式秘密回来,并且重新在农村中恢复基层组织。一年后,日军再度围攻国民党晋东南武装,太南地区国民党党政军高官及其县村政权纷纷投降日伪,中共各级组织借机进一步发展起来。

之所以在开篇要特别提到韩丁所描述的这段史实,是因为他所描述的潞城县张庄的中共基层村干部,和本文准备重点考察的长治地区的农村干部,既有许多相似点,也有着重要的比较参照的意义。长治北接潞城,两县均属太南,同为沦陷区,1943年以后亦先后成为中共武装活动的游击区。两者唯一值得重视的不同之处,就是韩丁看似不经意地提到的那个地理条件上存在差异。潞城北接太行山脉,境内山峦重叠、沟壑纵横;长治却地处太行、太岳、王层等山脉包围下的上党平原,自然条件颇为优越。相对而言,长治较潞城更富足,不仅人口多得多,上学识字的人也更多。故其基层干部的文化素质,理应不比潞城差。然而,如果按韩丁对张庄抗战期间几位年轻干部政治文化素养的描述,情况却好像又并非如此。这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读韩丁的《翻身》,更容易引起读者重视的,是他关于取得了农村基层政权的那些过去无地少地的年轻农民,“很容易走上追求享受、滥用特权的歧途”的那些描述。这方面的发现是他亲见、亲闻,且亲历过的事情,因而远比他听到的抗战期间张庄年轻农民不怕牺牲的故事来得更可靠。也正是因为这些发现,才导致他做出了下述思考:

地主阶级的独裁统治,被一批过去无地或者少地的年轻农民暂时取代了。他们苦大仇深,积极热情,勇于创造,向往美好的新世界。然而他们还有私心,很容易走上追求享受、滥用特权的歧途……这些领导人是从旧社会的污泥中爬过来的,身上还带有其出身的印记,他们有没有见识和能力来纠正那些损害运动的过火行为呢?他们能不能摒弃凭着领导地位而取得的一些特权利益,领导所有的穷人站起来,把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搞大生产……使张庄摆脱过去那种绝境呢?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见识和能力,那么谁有呢?^②

这也是本文之所以把韩丁的田野调查资料与长治的档案文献资料结合起来,对太南中共敌后农村基层干部群体状况及特性,做概略性考察和分析的原因所在。

抗战后期长治中共干部的基本状况

这里所以限定在抗战后期,是因为如上所述,太南如潞城和长治农村成为敌后中共与日伪和国

^① 关于中共撤军的原因及大体情况,可参见拙作《晋西事变与毛泽东的应对策略》,《史学月刊》2016年第1期。

^② 韩丁:《翻身》,第271页。

民党争夺的对象,其实只是1943—1945年间的事。抗战爆发后,牺盟会和八路军虽然在当地活动过两年左右时间,但1940年初大举撤出后,全部组织基础即告瓦解。1943年初中共方面才下决心重新恢复长治县的党政机构(县委和县政府)及其各级组织。^①为此,太行四地委派回了不少撤走的干部,然而其工作难度几乎相当于重建,而且非得借助文化程度较高的外来干部不可。

基于阶级观点和中共自身干部的特点,中共在干部选任的标准中并无文化程度(即受教育程度)的要求。但实际上,作为一个意识形态的党,它对理论学习的强调和对干部理解、把握政策水平的要求,是一以贯之的。因此,即使在依靠农民打天下的战争年代,它不仅坚持以党领政领军,而且从中央到地方,党各级主要领导人也几乎都由知识分子或中等以上教育背景的青年学生出身的干部担任。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开始突出强调工人农民的领导地位^②,在对县及县以上党政主要领导人的任用上,各级党委实际上仍旧坚持要兼具“政治、文化水平”^③,因此“知识分子干部”仍旧是选派的主要对象。^④

长治县党政领导机关是1943年开始恢复和重建的,其县、区两级主要领导干部都是中共太行四地委选派的。已知当年先后选派到长治担任新建县区两级领导干部的人员信息如表1。

表1 1943年长治新建县区两级领导干部情况表

姓名	职务	籍贯	年龄(岁)	党龄(年)	文化程度	成分	调入时间
郑国栋	县长	河南	30	4	高中	地主	1943.03
薛明	副书记	辽宁	28	5	高中	地主	1943.08
史宏泉	组织部长	河南	27	5	初中	地主	1943.08
张苏斌	宣传部长	河南	26	5	初中	地主	不详
康宇	公安局长	山西	25	5	初中	地主	1943.07
马怀信	公安股长	河南	26	5	高小	富农	1943.06
李来盛	交通局长	山西	22	3	高小	中农	1943.11
王长生	一区区长	山西	32	5	粗通文字	工人	1943.06
王六翔	二区区长	山东	26	5	高中	地主	1943.06
刘强	三区区长	山西	30	2	初中	中农	不详
王宗周	四区区长	河北	32	3	高中	富农	不详
冯贲	五区区长	河南	25	4	高小	富农	1943.08
尚光武	五区区干队副政委	山西	28	4	高小	中农	1943.08
备注	(1)本表中籍贯项中“山西”均指长治以外山西其他县。						
	(2)表中“成分”项为当年统一用法,实际指的是“家庭成分”。1945年以后该项基本改为两项:“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						

资料来源:长治县委:《干部调入登记表》(1944年2月16日);《干部登记》(1943年12月30日)。

① 据长治县委1943年下半年一份报告可知,1941年8月退出长治的长治干部曾在太行成立过一个“长治抗日人民执行所”,想要恢复群众工作,但直至1942年3月武工队成立后才部分回到长治。10月20日经上级批准成立了长治县工委,1943年1月正式改为县委,才真正开启重建组织的活动。参见《党和群众组织工作材料》(1943年4月27日)。

②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3页。

③ 若愚:《一九四五年几个问题的总结意见》(1946年7月30日),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7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84页。

④ 革命战争年代中共在党内使用的“知识分子干部”的概念不同于今日。毛泽东早在1928年就将只读过初中的陈正人定性为“知识分子干部”了。从延安整风开始,凡不是工农兵或军事干部,受过小学以上教育并从事文字工作的干部,常常都被称为“知识分子干部”。参见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从 1942 到 1943 年,整个太南敌后都处在需要新开辟游击区的情况下,所需高素质干部缺口极大。从表 1 即看出,作为太南核心区域的长治,太行四地委一时竟找不到合适的县委书记,只能暂时空缺。5 个区长,3 个初中以上、1 个高小程度,1 个粗通文字但党龄长,有过基层领导工作经验。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外来的、文化程度较高的干部,政治素质相对也较强。从 1943 年底长治县干部统计资料可知,这时被派回恢复组织的干部被捕和牺牲的比例相当高。多数干部这一年 3 至 8 月才派来,其中 13 人,即占年底县区干部仍在册总人数的 1/5 强,已经被捕或牺牲了。他们中区长就有 4 人(2 捕、2 死),其他除 1 名是本地干部外,1 名副区长,1 名公安干事,也是外来干部,学历是 2 人高中、1 人初中、2 人高小。并且,牺牲的 11 人,除被抓捕当场死亡者外,多数都是“大骂敌人,光荣牺牲”的。

1943 年底在册的县区党员干部 37 人,仍有 13 名,即 1/3 强为外来干部,他们的文化程度也都大大高于本地干部。县长和县委副书记为高中毕业,外省人;县委两部长、三区区长、县公安局长、公安局审讯股长、公安干事也是外来干部,大都读过初中,仅 1 人高小毕业。25 名本地干部中,仅 6 人(区长、秘书、组长、文书、干事、助理各 1 人)高小毕业。总计县区级干部中高中程度 3 人,初中程度 6 人,高小程度 9 人,高小以上文化程度干部共为 18 人,约占半数,余“粗通文字”或“少识字”者 19 人,均为本地农民干部。^①

将近半年后,新的干部统计表显示,四地委为长治派来了新的县委书记,并新调来 20 位左右外地干部。除去此半年中个别外调并又有十余人被捕、牺牲外,长治区县级党员干部的总人数增加到 58 人。其中高小以上文化程度者约 25 人,较半年前,县区干部的文化水平略有降低。^②

再一年后,即 1945 年 6 月的干部登记表显示,又有 11 名干部牺牲,在册党员干部人数已增加到 75 名。其中本地干部 43 人,达到 57%,有高小以上学历者仅 21 人,仅为 28%,余皆属“粗通文字”或“少识字”者。可知上级党委已没有多少干部可调了,从本地提拔上来的区级干部,使县区干部的整体文化程度进一步降低。^③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即从延安整风后中共中央大力倡导提拔工农干部的倾向来看,长治干部文化程度降低,从纯洁党的干部队伍的角度,未必没有好处。因为干部文化程度的高低,几乎都与他们的家庭出身和自身的阶级成分直接相关。那个年代无论在中国什么地方,能够供得起孩子上学的,至少都是家有余粮剩米的;普通农民孩子学历高者,其家庭的阶级成分通常也高。相反,“粗通文字”者多半是贫苦出身,“少识字”者其家庭不是赤贫,多半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因此,反映在抗战后期长治区县干部调查统计表相关信息的变动上,干部文化程度整体较高时,出身地主、富农及商人的比例必定高;反之,干部队伍文化程度整体较低时,出身贫苦农民的比例必定高。

长治县区干部阶级出身与文化程度这一变动的大体趋势,可见表 2。虽然这一变动只发生在抗战结束前的最后三年,但它与中共战后在农村贯彻阶级路线,包括整党整干,未必没有某种因果关系。

① 长治县委:《组织工作一些材料》(1943 年 12 月 30 日);《干部登记》(1943 年 12 月 30 日)。

② 长治县委:《干部登记表》(1944 年 5 月)。

③ 长治县委:《干部登记表》、《党员干部损坏登记表》(1945 年 6 月 22 日)。

表2 长治县区干部阶级出身、文化程度变化表

单位: %

年份	出身地富商人	出身中农	出身贫雇农	初小文化以上
1943	36	46	16	50
1944	24.5	26.4	24.5	39.6
1945	16.9	40	35.3	33.3

资料来源:长治县委:《干部登记》(1943年12月30日);长治县委:《干部登记表》(1944年5月);长治县委:《干部登记表》(1945年6月22日);《党员干部损坏登记表》(1945年6月22日)。

注:表中统计不尽完整,系因《干部登记表》中相关数据各有一些缺失之故。

长治组织重建期间区级干部的形象

1943年长治县的组织恢复和重建工作最初并不十分顺利,这期间不仅有力量对比的原因,也和初建过程中区村干部及其组织尚不得力有关。而最基层的村支部、党小组,以及村政权的恢复、重建和发展,相当程度上都需要靠区级干部起作用。但从这一年年底长治县委综合考察评估区级干部队伍的报告可知,至少县委主要领导这时对区级干部队伍整体素质的看法是负面多过正面的,同时报告也反映出,本地区干部对外来的县委领导也不是那么服气的。

报告称:现有区级干部中18—25岁12人,26—30岁将近20人,多数都是1938、1939年入党,但因此他们“初中以上程度只占五分之一,其余文化程度甚低,学习又差,进步甚慢(有三两个月不拿报纸与书),大大阻碍了这些干部政治上的提高。因此他们的工作效率极低,工作态度也不正常(腐化、情绪低、想家、怕威胁家等)”。这种情况在本地干部中反映得最明显,他们“多不称职,能力也极弱,政治上很落后”。报告也认为,敌占区的恶劣环境极大地造成了本地干部的思想混乱,他们“脑子中还存在不少糊涂观念(不杀人解决不了问题及左右摇摆等)”。一些人“是左倾不顾一切的蛮干”;一些人“是右倾畏缩的等待心理和两保险的变天思想严重存在”。报告批评部分负有领导责任的区长级干部对工作缺办法,仇恨心却极强,不知道一切要从爱惜群众、保护群众利益出发,同时还本位主义严重,“认老张老五不认上级”,甚至不把县委领导放在眼里,更不必说去顾及其他部门和群众的利益了。最严重的是许多干部经常性地违犯政策法令,有些干部贪污腐化严重,有些干部则表现为“工作中常有狭隘、报复、蛮干、顾头不顾尾、麻痹、各顾各又顾不了身边的现象存在”。还“有不少地方同志,眼一红就想杀上两个。如二区一气杀七个,四区为给宋周报仇,一气一天杀了九个。杀的虽都是汉奸特务,总有些不策略”。在县委领导人看来,长治一年来被捕牺牲干部甚多,尽做“亏本买卖”,这也是一个原因。^①

区干部在组织恢复和重建中的表现让县委不那么满意,当然不全是干部素质的问题。作为新开辟的游击区,在长治5个区中,真正能受中共控制的基层政权这时还极少,绝大多数编村还是据点林立,处在日伪或在国民党力量的严密控制下。即使少数形式上受到中共掌握的村子,非本村的区级干部也很难前去活动,因为日、伪、国民党几方面的特务、眼线颇多,常常是中共区县干部或小股武装白天到,晚上伪保安队或国民党武装就来突袭了。这种情况给区委联系基层造成了极大的障碍。三区负责人就承认,该区原本有工作基础,如有几个村子过去八路军在时给了群众一些利

^① 长治县委:《组织工作一些材料》(1943年12月30日)。

益,群众大都“人心向我”,村干部也敢于斗争和工作。但因本区敌人占绝对优势,据点多,再加上敌伪与国民党合流的影响,因此区委成立以来一直没有深入过下层,只是用行政命令来布置工作。因为不了解下情盲目指挥,导致群众利益受损,反而使得一些村子的群众疏远了我们。五区的情况也类似,大家都知道必须要联系群众,但区委开始工作后主要只是向群众要东西,没给群众利益,对群众的实际状况不了解,对敌伪也缺少调查研究,因此在争取群众的问题上常常找不到有效办法。^①

县、区部署的工作,包括组织重建,除了部分村子是区级干部起了重要作用外,很多都是靠从村干部提拔起来的区级干部在做工作。因为从安全的角度,只有他们才比较容易在熟悉他们的群众中活动。但是,这些很快被提拔到区级干部位置上来的农民干部,无论政治觉悟,还是文化水平,对达成上级任务要求,都自觉困难重重。

1944 年 3 月,长治县委利用生产度荒会议的机会,专门对与敌顽冲突很尖锐的二区干部的思想及工作情况,进行了一次摸底调查。调查后的报告中着重反映了 9 位到会负责农会和生产工作的本地农民干部的思想情绪。

谈到入党动机问题,其中 5 人都坦白地表示,当初入党并“不是为了革命”。有的说:“入党是为了吃得开”;有的说:“入党是为了起家,认为党是杀富济贫,能扶持自己”;有的说:入党“是(被)顽固逼的而参加了”;有的说:“入党动机是为了报复,自己公开不出头,领导群众干一下”……^②

谈到作为区级干部的作用、影响和责任问题,只有一人较痛快地表示:“生活困难,前途悲观,但是有时想起过去受顽固压迫,现在解放了,干吧!”其他干部一致表示自己能力太差,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上级交给的任务。有的说:“在工作上,上级要求汇报,自己很作难,反悔还不如当个村干部。可是不干又怕受批评,又怕群众看不起。”有的说:“工作上搞不出成绩,深入不下去,上级又要批评”;“党员又是吃苦在先,享乐在后,想着还不如不参加哩,什么时候才能享福呢?”有的说:自己“开会时情绪高,一看见实际就没办法了,自己也不识字,上级要些材料也完不成”;同时“在外边情绪高,一进家就情绪低了,因为家里没有劳动力,还没吃的,三口人种十亩地本来该吃不完”,实在觉得受罪,“只能自己怨恨自己”。有的说:对工作很悲观,但自己“是本地人,不好意思,能力低,搞不出成绩来又受批评”。有的说:“工作上没办法,上边抓得紧……自己能力低,不如当个通讯员,抗战胜利就算完,但是抗战几时胜利呢?”^③

抗战胜利前长治基层村干部的状况

长治以及同属太南的潞城、长子、屯留、襄垣、壶关诸县,因中共八路军一二九师及其工作团抗战初曾经驻扎并做过群众工作,一度大力发展过党员。故 1943 年上半年即恢复过去有过基础的 10 个村的支部和七八个村的党小组。但是,由于当初的党员发展十分粗放,加以沦为敌占区已三四年,即使这些迅速复建的党组织中,其干部的素质也是参差不齐的。

据 5 月县委报告称,同为支书,榔家村和看寺村村支书“工作积极、热情、群众中有威信”;任家庄支书过去胆小,“现锻炼得较强”,“对我忠实”,“能团结一大部群众”;鲍村村支书“素好打抱不平,能团结群众”;原村和冯村村支书“对组织有认识,责任心也有,团结群众好”,缺点都是“表现胆

① 《长治一三五区对几个问题讨论发言》(1944 年)。

② 《长治县第二区区级干部思想现状》(1944 年 6 月)。

③ 《长治县第二区区级干部思想现状》(1944 年 6 月)。

小”。其他支书大都“对组织认识模糊”，如南沟村村支书“为反贪污入党”；六家村村支书“为反对地主而参加我党”；前土门村村支书“社会经验相当丰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体贴穷人困难，又擅说合社会间各种纠纷为能手，以落好村中平和为其个人出发点……对组织认识模糊”；后土门村支书“表现忠诚、谨慎、胆小，有热情，对党认识差”。^①

1944年初，随着基层地下村政权数量的增多，长治县委组织了一次专门针对村级干部为期10天的集体培训。这次训练班抽调了表现较好的24人，其中不少是1938、1939年入党的老党员，但24个人的文化程度普遍都很低，只有1人读过高小，7人能读简单的文字，12人多少认得一些字，其余为文盲。即使是表现积极的贫农党员，不少在八路军北撤后也都表现得比较消沉，甚至动摇。报告称，24人中“给敌人做过事的有六人，给敌顽做过事的七人，给敌人而又给顽固做事的三人；向敌人自首的二人，向顽固自首的三人；赌过钱的十二人……参加咱们工作开小差回去的三人，偷过咱们文件给敌人者一人，卖过金丹毒品者二人；参加过青帮的一人，参加过圣人道者一人，参加过忠孝道者一人，参加过国民党的一人；吃过料面者七人，怕死请顽固客者一人”。^②

之所以会有上述表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对共产党的力量和胜利的前景缺乏信心。经过反复讨论、启发和鼓动，参训学员大都诉说了自己的顾虑所在。

有的“怕变天”，因为觉得敌人力大，国民党大批投敌，不仅敌人力量更大，而且有国民党降军协助，担心自己的家属亲朋随时都可能遭殃。有的相信“良心”，说：谁的心不是肉长的，“整日在村上碰来碰去，咱对[他们]客气，特务也会原谅咱们。他们若坏了心，咱们送些小礼，他们总不会再说什么，积极共处，互相保险，能保安全便不坏。”有的想报复，说：这几年受害受气太大，因此不报仇心不甘。这次来受训，就是想来商量商量，争取回去杀掉最恨的几个顽固派，“能够出出咱的气便痛快啦”！有的知道政府的政策法令，“也知道三区杀人最多，特务报复也最厉害，我们死人或被捕的同志也最多。可是又管不住自己不杀人不成的糊涂想法”。三区原村、西故县、定流等村的党员，在半年中活捉杀死土匪、便衣、地主，就不下40余人。^③

一年之后，即1945年1月底，长治县委再度举办村干训练班，这次招收学员48人（实到47人），连续学习了15天。^④这次学习训练，主要是想帮助解决最让县委担心的村干部中普遍存在的几个思想问题和作风问题：一是干部的阶级觉悟问题；一是对前途没信心、怕变天的问题；一是不能联系群众的问题。

从报告总结汇报的情况看，这次训练班对村干部阶级觉悟问题的解决，是比较顺利的。因为大部分受训的学员都认定，只有跟着共产党才可能过上好日子，因此，只要教会他们算剥削账，对那些靠着敌伪顽过着较富裕生活的地主富农的“阶级仇恨”就很容易建立起来。一旦划清了阶级界限，明白了“国民党专制是地主富人的天下”，只有共产党和八路军到来后“穷人才能说话”，“才能翻身”，“才能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多数人自然也就知道过去“糊里糊涂不知给谁干，困难了就不想干”的态度是错误的。同时，这也顺带“解决了本地人外地人[的隔阂]”，因为理智上没有人不明白“被压迫的应当一块儿干”的道理。^⑤

对前途问题，学员们最初谈到时仍很悲观。不过进入到1945年，大家担心的已经不是日本人，而是国民党了。早在国民党中央军统治那段时间，长治民间就在流传一个民谣：“老黄没要紧，就

① 长治县委：《长治党和群众组织工作材料》（1943年5月）。

② 《长治编村干部训练总结》（1944年1月26日）。

③ 《长治编村干部训练总结》（1944年1月26日）。

④ 《关于印发第一期支干整风班的总结通知》（1945年2月4日）。

⑤ 《第一期支干整风班的总结》（1945年2月4日）。

是南边怕”。^① 尽管国民党中央军被日军赶走两年了,但这几年国民党特务、武装对中共干部群众的威胁、抢掠和杀戮丝毫不比日伪来得少。特别是1943年春夏之交国民党中央军发起对延安的全面围堵,大有灭此朝食之势,更是让这些村干部感到紧张,害怕国民党、阎锡山会打回来。有学员明确讲:“四十万大军把八路军老地方(指陕甘宁边区——引者注)都包围了,说不定中央军哪天就过来了,这可怎么办? 分委说咱有八十万党员、五十万大军作后盾,可是离得太远怎么办? 眼看陕甘宁边区完蛋了,咱这里也就完了。”^②

由于相信共产党打不过国民党,到时候只能再来一次大撤退,自己也只好背井离乡跟着组织退到太行山上去,不少学员都表现出受不了,却又左右为难的态度。有几个学员就讲:“不干吧,在里了(指已经是党里的人了——引者注);不走吧,早弄明了(指身份已经公开了——引者注),不走也得跟上走了。”否则,“共产党前晌走了,咱活不到晌午,党员活不成,基本群众也活不成”。

即使是那些态度坚决的学员,也都相信共产党打不过国民党。只是他们的态度是:“我管他走不走呢? 他(共产党)在一天,我干上一天再说。”还有的是担心家人受害,因此扬言:“走以前一天崩上几个国特,他(中央军)过来了,也崩完了。崩完了再走,家就受不了害了。”

训练班针对这一情况,根据报载宣传材料,并结合太行太岳根据地和太南游击区发展情况,对胜利前景反复做了说明。到训练班结束时,不少学员都不那么悲观了。报告称,多数学员初来时都是迷迷糊糊的,觉得没前途,“经过整风,[大家]认识比较明确了”。有学员就讲:自己初来时确实不想干了,“受罢训觉得还有前途,回去干吧”。^③

相对而言,在训练班上最难解决的,还是“脱离群众问题”。虽然学员们全都是村干部,然而几乎全都有“自高自大看不起群众”“看不起穷人,不愿劳动”和“自私自利、贪污腐化、当小偷”等问题。

自高自大的主要表现是,“嫌群众落后,不如自己进步,因此对群众态度就是训斥和行政命令”。村里工作从不和非党的群众商量,全靠几个党员包办。

看不起穷人的主要表现是,认为自己是上级委任,让自己管群众的,因此总觉得自己比群众高一头。因为不喜欢干体力活儿,因而认为当了干部就有理由不下地了,甚至在互助组不出工还觉得理所当然。有些干部甚至还发展到嫌群众麻烦,动不动会打骂群众的程度。

所谓自私自利、贪污、当小偷,其实就是仗势权力多吃多占,甚至明火执仗地抢夺农民的劳动果实。这主要表现在多数村支书村干部都习惯搞特权、“占便宜”。一些村干甚至指挥民兵,“偷”群众的农作物,给自己享受。最极端者,某村支书为此专门“组织了一个司令部,自任司令,夜里指挥民兵,今夜偷葡萄,明夜偷梨,后日偷果,谁家有柿疙瘩就清查谁家户口,去了就吃”。^④

腐化问题,主要表现在乱搞男女关系上。当干部以前的不算,当了干部以后仍旧在嫖的,47名学员中就有31人。^⑤

对于上述问题,靠一次训练班当然不可能求得解决。训练班组织者甚至也只能组织学员们自己讨论改正办法,给出的讨论内容也是启发性的:“一个共产党员自私自利、贪污腐化,脱离了群众,对工作有些什么损失,对你自己前途危险不危险?”这样的讨论只能是走走过场罢了,有学员就公开表示听不进劝告,称“嫖破鞋”的毛病“不好改”,说:“要想改,得给我搞上个老婆”。但是,把

① 《长治对敌斗争参考材料》(1943年2月)。

② 《第一期支干整风班的总结》(1945年2月4日)。

③ 《第一期支干整风班的总结》(1945年2月4日)。

④ 《第一期支干整风班的总结》(1945年2月4日)。

⑤ 《第一期支干整风班的总结》(1945年2月4日)。

这些问题摊开来,面对面进行批评和讨论,受训学员至少都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是党组织所反对的,将来是可能给自己惹麻烦的,因而多数人还是表态想改。只不过,没有哪个想到的改正办法是真正有约束力的。一位村支书想到的改正办法是:“我要想到我村一个党员叫群众斗争了一回,我就不敢脱离群众了。”另一村支书想到的解决办法是:以后一做这事就想会生病,就不想做了。^①

县区村权力结构与县委的决定作用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太南地区县、区、村三级管理体制中,县委是地方与党中央联系的枢纽,更是中央指示贯彻执行落实的关键,因而上级党委对县委主要领导干部的任用标准首先看重的还是工作能力,集中地体现在对干部政治经历和文化程度的重视上。

这个时候县委的核心领导班子,包括书记、县长、副书记和党委组织、宣传两部长,通常不过4—6人。从长治县的情况可知,这时县委书记、县长一级的干部,全部都用的是外来干部,除1944年下半年派来的王琳,因为是老红军,1938—1939年在长治做过八路军工作团团长且兼过县委书记,比较熟悉长治的情况,因而未考虑学历外,其他几位的学历都在初高中以上。

区级主要领导班子,如各区区长、公安局局长和区委委员等,一般也是上级党委选择任命的。但因为上级党委的干部储备不足,因此长治最初5个区长选用的标准已明显低于书记县长级。与县委县政府作为权力核心和政治灵活的作用不同,区委区政府被设定为联系基层村的实际工作机构,因而所需人数差不多是县委县府的10倍上下。除个别关键岗位外,这样多的干部也就只好就地取材了。因此区干部中不仅本地干部较多,而且有些本地干部原本就是农民,仅粗通文字,还有不识字的。

在长治,恢复建立村一级支部和地下村政权,书记和村长副等选用1938、1939年入党过的农民党员很容易。但就像长治县委报告中说明的那样,因为当年组织发展带有“严重的感情拉夫主义”,“只追求数字,忽视质量”,吸收的党员除“一部分是为了维持地位,为了有势力和有事干,为了反对老财等,大多数是不知为了什么”。还“有的入了党不知道自己是党员,或知道是党员而不知参加的是什么党”。^②这也是为什么1941年3月八路军一撤,村的党组织会瞬间瓦解,有些人会违心地转去为日伪顽服务。但是,与日伪顽比,他们终究还是更认同共产党八路军,因此中共秘密回归后,绝大多数曾经参加过党的人明知有危险,思想上也有动摇,内心却还是愿意当“八路”。^③

上述情况决定了长治县、区、村三级党政关系的权力构成不能不是金字塔式的,在这种权力结构中,县、区、村三者具有相互依存,且上下贯通,基础相对稳固等特点。但县委毫无疑问是整个权力的核心与灵魂。中共县以下各项工作运转和作用的成功与否,明显地依赖于县委是否正确地传递上级党的政策方针,以及将其与本地实际相结合,灵活把握执行的能力如何。而作为最基层的村级党政干部作用的发生,更是全要倚赖于县委(透过区委)的指导、推动、命令与约束。

值得注意的是,长治重建组织和恢复群众工作之际,太行党的上级机关仍在执行毛泽东关于目前在敌后“应该是善于荫蔽自己,保存实力,处处为民众着想,要保护民众,使民众不致吃亏(也

^① 《第一期支干整风班的总结》(1945年2月4日)。

^② 《长治党和群众组织工作材料》(1943年5月)。

^③ 当时长治地区日伪顽及民间对暗中倾向和帮助八路军的人的一种称呼。

就是保存自己”的策略方针。该方针主张实行“革命的两面派策略”，即主张允许民众“有计划性的应付敌人的办法”，坚决反对一切可能引起敌人残酷镇压，造成民众恐惧的尖锐斗争的办法。^①故长治县委 1943 年时仍再三强调：我们的基本方针是争取群众，必须要在一切对敌斗争中“以保护群众利益为出发点”，同时努力“合理解决群众负担问题”。因此“要善于正确运用革命两面派政策，采取一切方式去麻痹欺骗敌顽”，并在此基础上争取把敌顽的村政系统在事实上变成我们的村政权。而得到群众的同情和拥护，“是抗日战争两面政权的社会基础与可靠的依托”。^②

在长治这样的敌占区采取这样的方针，显然极大地便利了中共争取大批农民党员干部的回归和党组织的重建。村里有了党的组织，把敌伪顽控制的村政系统转化为两面或三面政权，也就有了可能性。进至 1944 年夏，中共已经在长治县 5 个区中取得了对 55 个编村 368 个自然村的实际控制权，同时 80% 的村维持会政权也变成可资利用的两面或三面派政权了。

在争取群众同情和拥护的问题上，长治县委自始至终都注意到区级干部，尤其是村级干部在思想上和作风上存在的诸多问题。县委书记王琳到任不久，就明确主张，必须要从转变基层干部的思想和作风，大家全力去发现群众当下最关心和最急于解决的问题入手，来达成争取群众的目的。^③

1945 年初，在活动范围大大扩大的前提下，区、村两级干部均按要求深入到农民中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去了。此举不仅使老大难的村长副贪污腐化现象得到了遏制，而且也使干群关系发生了立竿见影的变化。如三区北大掌村干部发现一件村民受屈的事情后，以适当的方式解决了，马上就有其他村民也来找干部帮助解决类似问题。干部们帮助解决了后，村民们提出的问题也进一步增多了，而且连旁村的农民也找来了。最初来的南大掌村的村民还很紧张，临走时再三嘱咐干部：“千万可不要说是我给你说的！”但随着区村干部组成工作队进入南大掌村，发现各种问题六十多件，解决中又发现 40 多件后，农民已经不再害怕了。由区干部出面，甚至在南大掌村召开了群众大会，而群众也开始争先恐后地要求：“快点先给我解决，免得他（指投诉对象——引者注）知道了跑走。”^④

已知仅 1945 年 2 月，工作队在北大掌村解决小偷问题 3 件，贪污问题 6 件，不合理负担问题 2 件，其他问题 29 件；在南大掌村解决土地问题 16 件、房产问题 7 件、债务问题 94 件、雇工问题 13 件、小偷问题 10 件、贪污问题 1 件、其他问题 21 件。整个 2 月三区即解决了 13 个村的各类问题达 475 件之多。^⑤在各类问题中，“群众最关切的是自己的土地”，而几年来因受恶霸、特务及灾荒所迫，“贫苦群众的土地失掉的很多”，长治县委乘热打铁，依据上级部署的开展反奸清算斗争的指示，在长治实行了“反恶霸、反贪污、反夺地斗争”，又进一步开始尝试帮助失地农民解决土地或相关债务及赔偿问题。^⑥

这一系列工作开展的时间虽然不久，然而其效果很快就展现出来。1945 年夏，日本投降之初，国共两党为争夺以长治为中心的上党地区，进行了数万人规模的上党战役。在前后不过 40 天的作

^① 《毛泽东关于河北平原反“蚕食”斗争的政策致刘邓并彭左罗的电报》（1941 年 6 月 9 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2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48 页。

^② 长治县委：《两个月村政权工作总结》（1943 年 3 月 24 日）；长治县委：《长治党和群众组织工作材料》（1943 年 5 月）。

^③ 《长治工作近况》（1945 年 2 月 21 日）。

^④ 《长治工作近况》（1945 年 2 月 21 日）。

^⑤ 《长治县第三区十三个村群众问题处理件数统计》（1945 年 2 月 22 日）。

^⑥ 万青：《关于几种土地问题处理上几点说明》（1945 年 4 月 20 日）。

战过程中,中共地方党政部门,动员了长治、潞城、黎城、平顺、壶关五县干部、民兵、自卫队6万余人参战,12万人担任搭桥、修路、磨面、洗衣被和看护伤员等工作,同时成功地承担了供给和转运3万作战部队所需的几乎全部物资。^① 正是因为得到了如此充沛的人力、物力支援,中共太行太岳武装才得以一举歼灭阎锡山主力3.8万人,自此将国民党势力彻底逐出了上党地区。

战后解决农村基层干部问题的尝试与困境

在上党战役及随后的破城工作中,五县干部带领民工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与久已成为根据地的黎城、平顺、壶关三县干部与民工相比,长期处于敌后的长治和潞城的民工及其干部,就有着相当大的差距了。用长治临时军政委员会报告中的话就是:两者的表现清楚地反映出“新解放区与老根据地的群众觉悟不同”。

报告提到,黎、平、壶三县干部是县、区、村三级干部,根据民工所属区村,配比着带队来参加支前的,因此干部来的人够多,对民工也有一套宣传动员的办法,领导、组织、调度十分顺畅,民工的政治觉悟也很高,交给的任务都能积极主动去完成。相反,长治和潞城配备的干部人数明显少,再加上派来的干部和民工政治觉悟都较低,因而多有“支差应付态度”。一些家庭只是派些十四五岁的孩子来充数,如潞城15岁以下的就有245人,最小的才11岁。由于缺少管理、教育和纪律约束,部队打下长治后,长、潞两县支前的农民有些自行就跑回家去了,有些则各顾各地跑到县城仓库附近去拣便宜。对临时军政会布置的破城及拆除碉堡据点的工作,黎、壶、平三县民工在干部领导下,毫无怨言地积极完成了分配的任务;长、潞两县民工却怪话连篇,并出现严重怠工的情况,而且干部本身就态度消极,“不出力光聊天”。以至“如你问为啥不好好破呢?他就回答:‘还在乎我这一个人吗?’”^②

注意到老区与新区支前民众以及干部之间的这种差距,或许能够让我们联想起战时国共两军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以及体现在部队纪律和士气上的差异。同样是农民兵,同样是来自农民家庭的普通军官,何以到了中共军队里其农民小私有者的自私本性就能在相当程度上受到抑制?结合新老区基层干部和农民的不同表现,我们也能够看出,这种改变除了意识形态和领导意志的作用外,长期的宣传鼓动、思想熏陶、组织规训和纪律约束影响巨大。

换言之,中共虽然长期活动生长在农村,但它的核心领导集团始终是由有着一定文化程度和政治理想,信奉阶级斗争理论的知识分子构成的。他们除了依靠严格等级、分工和规则的科层制体制,按照党、政、青、妇、少和民兵分系统将农民组织起来,根据工作需要选派、选拔并训练干部,以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外,更格外重视党的政策方针的贯彻与落实。面对越往底层受教育程度越低的情况,中共逐渐摸索出一套分层进行政策宣讲和学习的工作方法。而越是老根据地,各级干部和农民就越是习惯于这样一种训练方式,其组织性、纪律性、政治敏感性和工作的自觉性,就相对较高。反之,凡属新区,如长治和潞城等,这方面自然就比不了老区。这也是为什么战后在这些地区推行土改运动时,中共通常都会选派有一定经验,且文化程度较高的干部,组成工作队,驻村指导,甚至直接推动和领导运动了。因为,就像韩丁在《翻身》一书中描述的那样,抗战胜利后在新区农村中获得无限权力的部分农民干部、党员及其民兵,往往很容易走向专横、腐化和徇私枉法。

^① 太行三地委:《长治战役中地方工作总结》(1945年10月)。

^② 长治临时军政委员会:《长治破城工作总结》(1945年10月29日)。

韩丁已经清楚地注意到,这类事情的发生在她所能了解到的范围内不是偶然的。“像这样的村子在区里并不只是张庄一个……。同样,在潞城县里发生这种事情的也并不只是一个第五区,而在太行地区的各县之中,潞城县也不算什么例外。”^①这样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就是靠上级党委派工作队入村,发动群众,踢开支部和村政府,整党整干,人人过关。但韩丁对这种一时的清查和惩罚式的斗争方法是抱怀疑态度的。他相信:农民离不开“共产党领导”。但他同时相信,根本上党还是要建立一种制度,让农民学会自己管理自己。^②深感庆幸的是,他临走时看到了他所认为的具有根本性的解决办法。

1948 年夏,中共中央决定在公民选举的基础上成立村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③用县委派来的工作队队长蔡勤的话来说:“现在,每个人都可以选举自己要选的人当干部。但是选举之后,获得多数选票的人要有办事的权力,所有人必须执行当选人作出的决定。……如果他不行,如果他不称职,你们可以另选人代替他。”这也就意味着,干部滥用权力的现象,以及整党运动中出现的无政府现象,都可以通过这一制度设计得到完满解决。

那么,村党支部以及党员干部还有没有领导地位呢?对此,蔡勤宣布说:“张庄人民代表大会,是全村最高的权力机构,共产党员必须服从和执行代表大会的决议。”党支部可以对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所有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意见,但如果代表们反对,党支部乃至上级党组织也只能“进一步解释,进行教育,以待将来统一认识”。在韩丁看来,这也就是说,“共产党无权以任何形式行使国家权力,它只能进行说服,树立一个榜样。当然,谁也不能阻止人民选举共产党员为张庄代表大会的代表,但是,共产党员不能比其他代表有更多的权力。共产党员只能通过自己内部的团结和解决难题的能力,而获得多数人支持来实现领导”。党支部和党的干部在村里不会有任何特殊的权力,并且必须依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责与规定行事。^④

韩丁深感遗憾的是,自己在张庄只呆了不足半年,没有时间来验证他上面的这些愿望和判断。他据此发表了他所看到和相信的史实,也留下了一些疑问。

当他再度来中国时,已经是 23 年以后了。这一次,作为“文革”中的美国客人,他已经不可能深入到张庄去参与那里人们的生活,张庄的干部们也没有可能像过去那样与他推心置腹地交流了。但是他还是敏感地注意到,他离开时所抱的期望不少没能实现。

他说,随着全国解放和新政权的建立,村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不复存在了,政权重归党支部领导。原先在农村中的各级党政部门多半都搬到新建的办公楼去,并用高大厚实的围墙和荷枪实弹的卫兵守卫了起来。即使经历了“文革”,大队革委会也还是围在高墙大院里,只不过村民可以自由出入罢了。到了公社一级,旧的官场习惯触目皆是。“在一个四面围有高墙的大院里有多个部门的办公室、政府机构,革委会办公室像过去的县衙大堂一样在最里面。”坐在堂皇的办公室里,新的政府继续干着旧衙门干的事情,“通过加盖公章签发文件、法令、通讯发票和收据。这些手刻的木头或石头大印上有单位的名称,级别越高,公章越大,最大的直径有 10—15 厘米,命令上盖的公章常常是代表官方的红色——表示命令所有的人执行。控制着公章就意味着控制着权力,抓住了公章等于抓住了权力。”结果显而易见:“干部脱离了群众,群众疏远了干部”,“干部容易产生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命令主义,而群众则容易感到自己地位低下,遇事必须恳求

① 韩丁:《翻身》,第 254—255、269 页。

② 韩丁:《翻身》,第 634—635、711—712 页。

③ 毛泽东:《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1948 年 5 月 25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25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15 页。

④ 韩丁:《翻身》,第 617、633—634 页。

甚至哀求”。^①

韩丁承认,自己可能高估了说服教育在张庄所具有的作用,尤其高估了张庄当年的民主试验。因为一方面,“经过选举而产生的村民代表大会或革委会的自主管理权,上级经常将其剥夺。”他怀疑上级就“不愿把地方实权托付给农民。因此没有党中央发起的、统一领导的群众运动,人民根本不可能向官僚机构挑战。运动一退潮,传统统治又卷土重来。”^②

另方面,他认定这是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文化影响和中国革命的农民性所决定的。“只要80%的中国人仍然是农民,只要他们仍旧被束缚在田地上用锄头种地,重建极权和精英统治的上层建筑的基础就会继续盛行不衰。”联系到“文革”期间在当地发生的种种状况,他更加坚信,除非实行民主,否则,“旧中国乡土长期存在的暴力不会轻易地让步于说服教育和正当的法律程序”。^③

但是,中共革命本质上是一场军事革命。领导革命的不能不是高度集中制的列宁主义政党。和列宁一样,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最看重的同样还是能否培养出“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和数万“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的中层领导干部的问题。用他的话来说:“党依靠着这些人而联系党员和群众,依靠着这些人对于群众的坚强领导而达到打倒敌人之目的。”^④这之后毛泽东也多次提到“下级与初级干部”文化水平太低,对政策的了解程度以及工作技术水平有限,必须抓紧教育提高的问题。^⑤只不过,抗战结束后,全国数以百万计的村庄再没有机会经历哪怕是像太南那样的游击阶段,解放、建政催生出来的无数农村基层党员干部更不可能得到像抗战敌后根据地那样近乎半军事化的战争历练了。但军事革命任务结束后,新的一个比一个更加困难和艰巨的革命任务仍然不断提出,因基层干部素质引发的问题,多半只能沿用以往战争年代形成的办法,即选派个别有经验的干部,带领突击培训过的少数知识青年,组成工作队,定期或必要时入村去解决。

〔作者杨奎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高士华)

① 韩丁著,《深翻》译校组译:《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香港,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182—185页。

② 韩丁:《深翻》,第717—718页。

③ 韩丁:《深翻》,第26页。

④ 参见毛泽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1937年5月8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7页。

⑤ 如毛泽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1944年12月15日),张迪杰主编:《毛泽东全集》第19卷,香港,润东出版社2013年版,第216—217页;毛泽东:《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1950年8月1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8—90页;等。



The Journal of Studies of China's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

No. 4, 2019

From War to Post-War: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Total War System in East Asia *Kubo Toru* (4)

The total war system of East Asia in the 20th century was formed in Japan and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and World War II. In order to launch the war of aggression, Japan adopted policies of building the wartime economy and generally mobilizing the national spirits, which affected its coloni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order to resist against aggression, tried to build the wartime economic system and mobilize citizens, and also made efforts to undertake constitutionalism and democracy. The wartime system of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ruled by Japan during World War II, such as Indonesia, was one of the elements that contributed to the post-war national independence.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in Japan, the wartime plans and the controlled systems were applied to post-war reconstructions, and still exerted influences after the wartime economy system had been removed. In China, the wartime controlled economy was temporarily interrupted after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nd then recovered again. Later,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 and in order to build a strong wartime system, the government chose the road of completely implementing controlled and planned economy.

The Allocation, Selection and Discipline of the Rural Grass-roots Cadr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Backstage Areas: A Case Study of the Rural Cadres in Tainan Area of Shanxi Province before and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Yang Kuisong* (14)

American writer William Hinton, in his book *Fanshen*, describes the post-war land reforms in Zhangzhuang, Lucheng County, Shanxi Province, which he had personally experienced. He clearly noted: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landlord class has been temporarily replaced by a group of young peasants who used to have no land or little land." These cadres, who crawled from the sludge of the old society and had the mark of selfishness of the peasants, with low knowledge and abilities, being often easy to go astray in the pursuit of enjoyment and abuse of power. William Hinton therefore asked: could they abandon the privileges gained by leadership and lead all the poor to stand up, and get Zhang Zhuang out of the desperate situation of the past? "If they don't have such insights and abilities, then who has?" Obviously, this is a problem that must be faced and solved for the CPC that maintained to rural revolution for a long time.

Cash Transportation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before and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Total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Pan Xiaoxia* (28)

Around 1937, in the face of a possible large-scale Sino-Japanese war,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made plans in advance and launched financial mobilization. Among them, the financial mobilization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did a lot of works about funds, the most superficial and core part, needed by the war. Large-scal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sh transportation prevented Chinese finance to suffer losses to the maximum extent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total war, forming a situation of financial firmness and foreign exchange stabilit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These virtually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government credibility and social confidence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total war. However, to a great extent, the action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to transport cash, bonds and silver was passive. The internal movement of cash and bonds and the external transportation of silver, the priorities of silver transportation in different areas, basically depended on the next specific goal of Japan's aggressive war.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failed to make an overall plan for the transportation of those things.

Politics in Celebration: The 2600 Years of the Japanese Era and the Occupied Areas of China *Xie Ren* (38)